



## 建国以来毛泽东对中东阿拉伯国家局势的论断

刘志华

**[摘要]** 在1956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建交后,毛泽东对于中东阿拉伯地区主要关注1955年缔结的巴格达条约、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1958年2月埃及与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58年7月伊拉克政变以及美英入侵黎巴嫩和约旦、60年代前期北也门的经济建设、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70年代前期南也门的社会制度等问题。毛泽东特别重视新月地带的伊拉克、地跨亚非的埃及、阿拉伯半岛的也门,将走向共和的上述三国视为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支点,既因应中美中苏关系的演变,又服务国内局势的需要。

**[关键词]** 毛泽东;对外战略;中东局势;阿拉伯国家;苏伊士运河战争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6)04-0049-56

**DOI:**10.13549/j.cnki.cn11-3959/d.2016.04.008

“中东”是泛指西亚北非诸多区域的地缘政治学称谓,阿拉伯国家位于中东的核心地带。1956—1990年阿拉伯国家先后承认新中国,到2016年恰逢中阿建交60周年,为此《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首次发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出访沙特与埃及。另外,2016年也是毛泽东逝世40周年。因此,研究建国以来特别是1956—1976年毛泽东对中东阿拉伯国家局势的论断,具有现实意义。

然而,关于建国以来毛泽东对中东阿拉伯国家局势的论断,学界研究非常薄弱,原因有二。一是学界研究倾向。研究毛泽东外交思想与政策的学者,主要关注他对周边国家、西方国家的论断以及“三个世界”构想;研究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学者,侧重区域国别史研究,或关注西方国家对这一地区的政策。二是原始资料问题。主要资料散见于13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简称“文稿”),《毛泽东外交文选》(简称“文选”),《毛泽东文集》第6—8卷(简称“文集”),《毛泽东传(1949—1976)》(简称“传”),以及6卷本《毛泽东年谱(1949—1976)》(简称“年谱”),其中“年谱”和“传”所载资料需逐页筛选。“传”对阿拉伯诸国着墨甚少;“文

集”第6—8卷出版晚于“文选”,且前者收录的涉外文章基本依据后者刊印;因此“传”和“文集”对本文参考价值较低。相比之下,“文稿”注释周详,所收录电报、信函、毛泽东生前审定的谈话记录具有较高史料价值,但不够全面;“年谱”涵盖方方面面,许多讲话内容系首度公开,但注释略显单薄,且某些重要谈话系间接引用。因此,唯有综合利用“文稿”、“文选”和“年谱”,才可基本完成史料征引工作。可见,研究毛泽东对中东阿拉伯国家局势的论断,又具有学术价值。

综上所述,笔者以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三大区域——新月地带、阿拉伯半岛、埃及为地理线索,综合梳理“文稿”、“文选”和“年谱”的相关资料,着重阐述1956—1976年毛泽东对巴格达条约组织和伊拉克军事政变、对南北也门、对苏伊士运河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论断,最终揭示上述论断的基本特点以及上述地区在毛泽东对外战略中的地位。

### 一、新月地带:以伊拉克为重点的观察

新月地带阿拉伯诸国位于地中海东侧与波斯湾北

岸之间,包括伊拉克、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可谓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十字路口,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考诸“年谱”可以发现,毛泽东对于中东阿拉伯地区主要关注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局势,而伊拉克又是重中之重。

#### (一)关于1955年缔结的巴格达条约组织

伊拉克位于新月地带南部,其前身是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所设巴士拉、巴格达与摩苏尔三省。伊拉克在一战期间被英国占领,从1920年起由后者实行委任统治,到1932年成为独立王国。1955年2月亲西方的伊拉克与土耳其在巴格达签署《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条约》即《巴格达条约》。美国的盟友英国、巴基斯坦、伊朗在当年相继加入该条约。同年11月巴格达条约组织成立,美国不仅是观察员国,而且充当军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反颠覆委员会会员国。巴格达条约组织具有鲜明的亲美反共倾向,并与北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连为一体,构成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弧形包围圈,引起中国的反感和疑虑。1956年6月13日与10月22日,毛泽东先后向巴基斯坦驻华大使与总理表示,他反对该国加入巴格达条约。<sup>[1]</sup>

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并处决国王,不久建立共和国。<sup>[2]</sup>新政权深受纳赛尔的影响,崇尚阿拉伯民族主义,仇视西方国家,憎恶巴格达条约,亲近社会主义阵营,并于同年8月承认新中国,毛泽东倍感欣慰。毛泽东在8月2日与赫鲁晓夫会谈时、8月17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9月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巴格达条约组织固然“是侵略性的”,但“这回在巴格达不是搞了一个洞吗?”因此“并不巩固”;而且受到“民族主义力量”和“共产主义力量”夹击,只是“很薄的一道薄板墙”;“所以,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sup>[3]</sup>在他看来,新政权退出条约只是时间问题,该组织已被釜底抽薪,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名不副实。1959年3月伊拉克果然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当年8月该组织更名为中央条约组织,处在阿拉伯国家与社会主义阵营夹缝中,对中国的威胁不复存在,毛泽东便不再关注该组织。

#### (二)关于1958年7月伊拉克政变、美英入侵黎巴嫩和约旦事件

1958年2月埃及与叙利亚两个共和国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并希望吸纳其他阿拉伯国家加入,最终建立统一、独立和共和的阿拉伯国家。阿联成立后,阿拉伯君主国非常恐慌。在美英支持下,同属哈希姆家族的伊拉克与约旦王室在当月

建立阿拉伯联邦,抵制阿联的政治攻势。然而好景不长,7月14日伊拉克发生政变,君主制被废黜,刚刚成立的阿拉伯联邦分崩离析,巴格达条约组织遭受重创,严重打乱美英对中东的政治安排。于是,美国立即向黎巴嫩派遣海军陆战队,英军则被迅速空运至约旦。<sup>[4]</sup>正如8月1日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所讲:“这次美国非常惊慌失措。伊拉克事件一爆发……就在当天采取了行动,早晨三四点钟,艾森豪威尔就召集会议,决策:如不上去,中东就完了。”<sup>[5]</sup>

伊拉克政变与美英入侵黎巴嫩和约旦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极为重视。7月15日下午、16日下午和晚上、17日凌晨和晚上,他多次开会讨论伊拉克问题。另外,尽管黎巴嫩和约旦均未承认新中国,但美英的侵略行动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18日晚至19日凌晨,他召开会议讨论英国侵略约旦问题以及中国发表声明等事。20日晚他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际形势与我军准备问题。<sup>[6]</sup>毛泽东针对伊拉克、黎巴嫩和约旦事件所开的会议,次数之多、时间之长,人数之众,实属罕见。

7月21日至22日毛泽东开始向苏联驻华大使表明中方态度。21日晚至次日凌晨,尤金在与毛泽东举行会谈时,首先向其汇报苏共中央对中东问题的判断:美英继入侵黎、约之后,可能对伊拉克开战,且似乎准备进攻社会主义阵营,但社会主义阵营目前不宜对美英开战。毛泽东立即表态:“他们不准备打。”即美英不会入侵伊拉克,更不可能进攻社会主义阵营。接着,毛泽东从美英兵力、国内政治、北约成员、世界舆论和革命形势五个方面予以说明:一是兵力不足。二是“国内不一致”,仅以“统治阶级的内部问题”为例,美英此举遭到本国在野党议员的反对,“因为亏理”。三是“在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得到支持”,比如北约竟未开会讨论此事,也就不可能支持美英。四是世界舆论对共产党的和平运动有利,而对美英的侵略行径不利,后者反倒“起了宣传员的作用”,可以清楚表明“谁主张和平,谁搞战争”。五是欧、亚、非、拉四洲正在“酝酿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到处都是干柴”,美英顾虑较多。他得出结论:“他们不敢打”特别是“不敢打我们”,所以社会主义阵营“不必打”。<sup>[7]</sup>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美英军队后来撤出黎巴嫩和约旦,并未入侵伊拉克,更未进攻社会主义阵营。

1958年8月1日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交谈时愈发乐观,估计美军将撤出黎巴嫩:伊拉克事件发生后,美国决定借机“先吞掉伊拉克,然后吞掉整个中东。”但

“力量有限，困难甚多”，其中“美国最大的困难是，世界舆论不在美国方面。”因此美国只能“大吹大擂，装腔作势。好像要大干的样子，但结果只有一万二千人。”他得出结论：“外强中干”的帝国主义“肯定”“要退”，“中东这次我们胜了”。<sup>[8]</sup>

8月3日赫鲁晓夫结束访华后，毛泽东意犹未尽，在此后一个多月向党内高层多次阐述他对伊拉克、黎巴嫩和约旦问题的论断。他在8月1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9月5日和8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观点更进一步，认为美英若推迟撤军，更有助于动员世界人民反美反帝，从而使驻军成为“众矢之的”的“靶子”，或“成为死结”的“绞索”。<sup>[9]</sup>

伊拉克、黎巴嫩、约旦事件尘埃落定后，1959—1960年毛泽东两次对外国客人讲，三国问题表明1958年美国在中东遭受挫败。1959年3月3日会见拉美15国共产党领导人时他说：在过去一年里世界上发生10件对美不利的事件，其中包括伊拉克革命，以及美国侵略黎巴嫩遭全世界反对。<sup>[10]</sup>1960年5月9日会见伊拉克代表团时他说：伊拉克革命“曾经使帝国主义吓了一跳”，引发美英入侵黎巴嫩和约旦事件，然而“在全世界人民反对之下，他们后来不得不走路。”<sup>[11]</sup>

## 二、阿拉伯半岛：以也门为重点的考察

也门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阿拉伯国家之一，也是1971年前唯一承认新中国的阿拉伯半岛国家。因此，毛泽东主要关注也门局势。

### （一）北也门

也门地处阿拉伯半岛西南角，在16世纪前期被奥斯曼帝国征服。1918年，战败的奥斯曼帝国从也门撤军，伊斯兰教什叶派遂在也门中北部建立伊玛目国，定都萨那，此为北也门之始，也门分裂。<sup>[12]</sup>1934年也门伊玛目国相继获得半岛大国沙特与中东霸主英国的承认，并改称也门王国。<sup>[13]</sup>1956年9月也门王国与新中国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此后两国官方往来增加，会晤级别迅速提升。1958年1月2日毛泽东会见也门王国副首相时说：“阿拉伯国家石油多、财富多，但被帝国主义霸占去了。你们……只要赶走了帝国主义，就可以训练自己的技术干部来开发。”<sup>[14]</sup>其实也门是阿拉伯半岛唯一的贫油国，而且缺乏技术干部，于是中国斥资0.7亿法郎，在北也门援建第一家纺织厂（1万锭）和第一条公路（230公里）。1960年12月29日毛泽东再次会见北也门代表团时，曾提及这家纺织厂并询问这条

公路的长度与走向。<sup>[15]</sup>

1961年，在埃及纳赛尔政权支持下，北也门出现自由军官组织，倾向颠覆君主制。1962年9月老伊玛目驾崩，其子继任。在新旧交替政局不稳之际，以阿卜杜拉·萨拉勒为首的自由军官发起军事政变，取缔伊玛目制，创建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伊玛目逃往山区。<sup>[16]</sup>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亲近埃及等阿拉伯共和国，与社会主义国家普遍交好，在1963年2月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关系继续升温。1964年6月9日毛泽东会见阿卜杜拉·萨拉勒总统时说：“我们主张平等待人”，而“你们看得起我们”，因此“我们很感谢”。<sup>[17]</sup>然而此后数年北也门君主派与共和派陷入内战，前者倚重沙特等阿拉伯君主国，后者得到埃及等阿拉伯共和国支持。<sup>[18]</sup>1967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及惨败。纳赛尔被迫从北也门撤军，共和派失去靠山，阿卜杜拉·萨拉勒下台，君主派重掌实权，共和国仅剩招牌。<sup>[19]</sup>北也门与中国的关系渐趋冷淡。恰在此时，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遂将注意力转向南也门。

### （二）南也门

亚丁位于也门南端，扼守红海与阿拉伯海的航道。英国人在19世纪初获准在亚丁使用港口并租借土地，并在几十年后占领这一要地。1967年英军撤出亚丁并将权力移交“南也门民族解放阵线”，南也门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定都亚丁。<sup>[20]</sup>“南也门民族解放阵线”出现于1963年，自成立伊始就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浓厚色彩，得到埃及纳赛尔政权的赞赏和支持。<sup>[21]</sup>南也门人民共和国也与中国交好，两国在1968年1月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69年6月执政党“南也门民族解放阵线”中的激进派发起政变，全面效法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举措。<sup>[22]</sup>1970年8月11日毛泽东会见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时，谈及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我们犯过许多错误，遭受过许多挫折。”“现在稍微聪明一点，也没有资格向你们逞英雄，只是把我们犯过的错误告诉你们。”<sup>[23]</sup>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结束访华行程后，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于1970年11月将国名改为也门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为“阿拉伯世界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国家。”<sup>[24]</sup>为了表示对南也门社会制度的支持，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抱病会见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这是两人第二次会面。他说：“未来总是光明的”，不过需要“斗争”才能达此目的。<sup>[25]</sup>

## 三、埃及：以苏伊士运河以及阿联为核心的观察

埃及位于红海西侧和地中海南岸，是联接亚非的

桥梁,为周边强国的必争之地。苏伊士运河由法国人沿埃及苏伊土地峡开凿而成,自1869年通航后逐渐成为连接英国与印度的海上生命线。运河通航后数年,英国购买运河公司中的埃及政府股份,入侵埃及并驻军运河区。1914年奥斯曼帝国与英国开战,后者遂于年底宣布埃及脱离帝国并处在英国保护之下。一战结束后,埃及爆发1919年革命,到1922年迫使英国承认埃及独立;但英国提出“四点保留”,其中包括驻军运河区。1936年英埃签署同盟条约,取代“四点保留”,规定英国在之后20年仍可驻军运河区。二战结束后,法鲁克国王与英国在埃及势衰。1952年7月23日,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发动革命,控制开罗,国王成为傀儡。翌年6月,君主制覆灭,埃及成为共和国。1954年10月19日两国政府签署《关于苏伊士运河基地的协定》,规定英国武装人员在和平时期不得进入埃及,全部英军应在1956年6月前撤出埃及。<sup>[26]</sup>两次大战后埃及的斗争成果,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1954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尼赫鲁时曾提及此事。<sup>[27]</sup>1956年5月埃及与新中国建交,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阿拉伯国家;叙利亚亦紧随其后,于同年8月与新中国建交。因此,从1956年起,毛泽东非常重视埃及,尤其关注苏伊士运河与埃及—叙利亚关系。

#### (一)毛泽东关于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的论断

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包括两个阶段:一是7月底至10月底运河国有化,以及英法与埃及的外交纠纷;二是10月底至次年1月英法以三国与埃及的军事较量,即苏伊士运河战争,又称第二次中东战争。

##### 1. 毛泽东对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事件的预测

1956年7月即英军撤离埃及后一个月,埃及决定接受由世界银行提供的阿斯旺大坝贷款,但美国突然撤销贷款计划,从而激怒纳赛尔,他在月底宣布将运河公司国有化,准备将公司收益用于向大坝项目注资。此举对美国影响甚微,却使英法与埃及的矛盾迅速激化。由于驶向英国的多数油轮都要通行运河,因此艾登首相怒不可遏,将纳赛尔比作希特勒,希望他悬崖勒马迷途知返。由于对纳赛尔的斗争意志估计不足,英法从7月底到10月底试图和平解决争端,似乎并无出兵迹象。<sup>[28]</sup>是为运河公司国有化事件。

纳赛尔宣布将运河公司国有化后,毛泽东积极予以支持。9月17日他在接受埃及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致答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并且相信在这一斗争中埃及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sup>[29]</sup>他在与

后者交谈时重申,由于“埃及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所以“全中国人民都支持埃及”而且“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不仅如此,他估计亚非拉人民都支持埃及。他特别强调苏美的立场:“苏联会全力帮助埃及的。”美国也会同意埃及将运河公司国有化,原因在于美国认为“运河在英、法手里和在埃及手里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想借这机会把英、法从中东赶出去,以便建立他自己的势力。”他甚至对纳赛尔的才德不吝赞词:“纳赛尔总统的做法很聪明,他有时硬,有时软”,“巧妙地利用了帝国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间的矛盾。”“纳赛尔总统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sup>[30]</sup>

针对运河公司国有化事件,毛泽东在9月17日与埃及驻华大使交谈时,直接向埃方提出若干建议。一是分阶段实现国有化;二是利用英法内部的矛盾;三是提醒纳赛尔加强安保。<sup>[31]</sup>

毛泽东还估计英法不会贸然入侵埃及。8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审阅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时加写:目前出现新的国际形势即“帝国主义国家”在“尖锐的国际争端”中“不敢轻易动用武力”;“这一新形势”在“最近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更加鲜明地摆在人们的眼前”。<sup>[32]</sup>10月3日毛泽东会见记者曹聚仁时说:由于“有九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反殖民主义的国家”都“反对战争”,英法与美国也不“一致”,加之英法人民的反战情绪,所以“现在他们对苏伊士运河都没有办法”,“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越来越远了”。<sup>[33]</sup>

##### 2. 毛泽东对苏伊士运河战争的研判

但在10月29日,为打破埃及对蒂朗海峡的封锁,以色列在英法支持下突袭西奈半岛;不久英法伞兵在塞得港着陆并占领运河北段;埃军遭遇败绩。出人意料的是,纳赛尔的军事失败居然演变成政治胜利。英法没有控制整条运河,以色列未能获得阿拉伯人承认,美苏在联合国一致谴责这次入侵,联合国紧急部队驻扎在可控蒂朗海峡的沙姆沙伊赫。<sup>[34]</sup>毛泽东密切注意战事的进展,于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特意提及“英、法武装侵略埃及”事件。<sup>[35]</sup>

1956年12月英法军队被迫撤出埃及,1957年1月纳赛尔废除1954年英埃《关于苏伊士运河基地的协定》,运河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战争结束后,毛泽东于1957年1月27日在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时说:中东“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帝国主义国家的争夺集中”在这一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因此“苏伊士运河事件”可以反映“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

“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其中前者“矛盾大些”。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他强调，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sup>[36]</sup>

### 3. 毛泽东对“苏伊士运河事件”的评论

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事件和由此导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让毛泽东对埃及、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刮目相看。1957年11月18日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而在他罗列的“十件证据”中，有四件发生在中东地区，其中就有“苏伊士运河事件”。<sup>[37]</sup>直至20世纪60年代前期，他仍对这一故事念念不忘，将其作为阿拉伯与非洲国家成功抗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典型案例。他在1963年4月24日会见埃及政要时和1964年7月9日会见亚非拉客人时，盛赞埃及在运河事件中的表现。<sup>[38]</sup>

#### (二) 毛泽东关于1958—1961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论断

在苏伊士运河战争前后，埃及与叙利亚均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渴望统一阿拉伯世界，叙利亚则更为积极。1958年2月1日两国总统纳赛尔与库阿特利在开罗签署宣言，宣布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两国分别成为阿联的南区和北区。接着两国议会迅速通过阿联临时宪法。2月21日两国公民投票选举纳赛尔担任阿联总统。<sup>[39]</sup>

阿联的成立，意味着阿拉伯民族主义取得阶段性胜利，世界反美反帝力量继续增强，因而毛泽东积极予以支持。1958年2月23日他以国家主席名义致电纳赛尔，祝贺阿联成立与纳赛尔当选总统。<sup>[40]</sup>5月4日他会见阿联代表团时说：中国在东方坚持反帝，而“你们在西方挡住帝国主义”，所以中国与阿联“都是一条战线”，理应“互相支持。”<sup>[41]</sup>会见时，易卜拉欣向毛泽东转交纳赛尔3月29日信，毛泽东托其向纳赛尔转交热情洋溢的回信，表达联合反帝的意愿。<sup>[42]</sup>阿联的不结盟倾向，促使他重新思考“民族主义国家”与美国的复杂关系，从而修正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的个别观点，在1958年6月16日与9月2日先后对中国数名外交官和巴西记者谈及这一思想转变。<sup>[43]</sup>

毛泽东还密切注视阿联的派别冲突。阿联成立

后，纳赛尔将埃及各项制度强行复制到叙利亚，在经济领域推行土改和国有化，在政治领域高度集权，在军事领域形同占领，从而恶化与叙利亚各派的关系。1959年12月31日胡拉尼等数名复兴党阁员宣布集体辞职，抗议纳赛尔“依靠情报、宣传和压力机构的个人统治已延伸到叙利亚地区”。<sup>[44]</sup>1960年1月4日中国驻大马士革总领事馆就此事致电中国驻阿联大使馆并外交部，题为《对纳、社关系全面破裂的几点看法》。1月14日毛泽东将电报改称《纳赛尔与社会党全面破裂》并批示：“看，阶级斗争是何等尖锐！资本主义世界都是如此，不可能有例外。”<sup>[45]</sup>

1961年7月纳赛尔强行在叙利亚实施“社会主义法令”，叙利亚人对埃及人的忍耐达到极限。<sup>[46]</sup>1961年9月底大马士革军区部队发动政变，宣布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sup>[47]</sup>昙花一现的阿联解体后，叙利亚与埃及龃龉不断，但毛泽东希望它们捐弃前嫌团结反帝。1965年3月23日毛泽东会见叙利亚代表团时说：包括“阿拉伯民族”在内的“各个民族”“都是有战斗性的”，但“一两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如果你们团结起来，帝国主义的阴谋就不可能得逞。”因此，“我们希望你们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sup>[48]</sup>

#### (三) 毛泽东关于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论断

1967年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谴责以色列发动突袭。6月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悍然对阿联、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略。”“我们坚决站在阿拉伯人民一边，坚决支持他们反对美、以侵略的正义战争。”

6月6日下午毛泽东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时，还对战争的起因、规模、对策、时间和结局进行了分析。

关于战争起因，毛泽东说：“阿拉伯世界石油的大部分，约百分之六十，被美国控制，百分之三十五受英国控制。”因此，战争是美英策动的，两国的“主要目标是争夺石油。”

关于战争规模，毛泽东指出：可能是打“局部战争”，“主要是以色列和阿联打”，即埃以两家对抗；但是，如果以色列胜出，则战争规模“可能上升”。

关于埃及可能采取哪些对策，毛泽东根据一战、二战和第二次中东战争时的情况，估计：“他们可能会封锁苏伊士运河，至少在战时是这样。”“如果整个阿拉伯民族都卷进去，有可能把苏伊士运河堵死。”此举会“对

他们自己造成一些损失”，对美国影响不大，“但主要是整英、法、德”，因为“欧洲这些国家主要烧石油”，而“英、法、德的石油主要是靠这条运河运输”。

关于战争时间，毛泽东说：“战争既然打起来了，就可能打一会。”即战争不会耗时太短。

关于战争结局，毛泽东认为以色列可能获胜，但不可能占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全境：“如果没有别的国家参加以色列一边，光是它一个国家的军队要占领阿联、叙利亚、约旦，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阿拉伯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是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同阿联联合，连老殖民地国家利比亚，以及约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也都和阿联联合在一起。”<sup>[49]</sup>

然而，出乎毛泽东所料，以色列仅耗时六天就击败埃及、叙利亚和约旦，故这场战争又称“六天战争”。到6月10日战争停息时，以色列已占领加沙、西奈、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不过正如毛泽东所料，它并未占领三国全境。

#### 四、中东阿拉伯国家在毛泽东对外战略中的地位

查阅“年谱”、“文稿”和“文选”可以发现，建国以来毛泽东对中东阿拉伯国家局势的论断，具有如下特点：

##### （一）全面性、重点性、持续性和阶段性

一是全面性和重点性。中东阿拉伯国家主要包括新月地带、阿拉伯半岛与埃及三部分，毛泽东的论断已涵盖上述区域。对于埃及这个人口最多的阿拉伯国家，毛泽东聚焦沟通大西洋与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以及埃及—叙利亚关系；对于新月地带，毛泽东首重这一地区面积最广、人口最多且面向海湾的伊拉克；对于阿拉伯半岛，毛泽东关注扼守曼德海峡的也门。埃及、伊拉克与也门三个国家，不仅面积广大、农耕发达、人口众多、位置险要，而且均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立场，在1953年、1958年、1962年先后走向共和，之后长期奉行反西方的外交政策，从而成为毛泽东在中东地区的绝佳盟友。

二是持续性和阶段性。从1956年中阿建交到1976年离开人世，毛泽东始终密切注视中东阿拉伯国家局势，自不待言。在此期间，毛泽东对这一地区的关注重点，呈现从东边的伊拉克——西边的埃及——东边的伊拉克——西边的埃及的迁移，同时从重视北也门转向扶助南也门。

##### （二）服务中国内政需要

1949—1953年毛泽东着力消灭国民党军队、抗美

援朝、土改、镇反、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以及克服财政危机，其对外战略首重中苏同盟、中美斗争与中印交好，努力创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对于中东阿拉伯国家局势，无心亦无力置评。1954年至1956年上半年毛泽东集中精力实施“一五”计划，奠定工业化基础并实现三大改造，其外交活动依然聚焦周边国家，比如中国与印度和缅甸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只是偶尔论及中东局势。从1956年秋中共八大召开到1959年夏庐山会议前，毛泽东、中共和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中的地位显著提高，毛泽东开始从阵营和共运的整体利益角度审视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局势；恰在这一时期，中阿建交、苏伊士运河事件爆发、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涨并推动阿联成立、伊拉克废黜君主制并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美英入侵黎巴嫩和约旦，上述大事推动日益自信的毛泽东愈发关注中东局势，并将上述形势与台湾问题联系起来。1959—1962年，由于“三面红旗”等因素，中国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与此同时中印发生边界冲突，加之阿联解体与阿拉伯民族主义陷入低潮，毛泽东便暂不过问中东事务。1963—1965年中国经济得到恢复，加之阿尔及利亚革命进入关键阶段，毛泽东便以极大热情支持埃及以西的马格里布革命，对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关注日渐稀少。1966—1976年中国出现十年内乱，而且毛泽东精力不济，中国与毛泽东在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不比以往，因此他对中东阿拉伯国家局势的分析，仅限于1967年6月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及在1969年后奉行激进政策的南也门。

##### （三）围绕中美、中苏关系

在20世纪50年代，中苏是友好同盟，中美则尖锐对抗，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中国的合作对象，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承认新中国，几乎全部新独立的亚非拉资本主义国家都反帝并与中国交好。于是，毛泽东将整个世界分成“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民族主义”（或“中立主义”或“中间地带”）和“帝国主义”（有时突出美国，而将西方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归入“中间地带”）三部分，后两者同属“资本主义”但立场迥异。毛泽东于1956年10月19日会见巴基斯坦总理时、1958年7月21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时、1958年8月17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1958年9月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多次系统阐述上述见解。<sup>[50]</sup>因此，维护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联合亲近东方的民族主义，坚决对抗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基本依据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分敌我，就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特点。

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苏论战期间,社会主义阵营已经瓦解,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运中处境孤立;但与此同时,中美依旧尖锐对抗;中美矛盾仍然大于中苏矛盾。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对外政策只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运领域发生变化,但在中东阿拉伯诸国仍旧维持反美反帝的基调,详见毛泽东在1964年1月5日与1965年3月23日先后会见日共友人与叙利亚代表团时的讲话。<sup>[51]</sup>

因此,从1949年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毛泽东对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主要目的在于建立反美反帝的统一战线。他反对巴格达条约组织,因为该组织亲西方反东方;他赞赏伊拉克军事政变,是由于这一事件重创巴格达条约组织并使亲东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壮大,进而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势力。他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并抗击英法以入侵,旨在削弱美国盟友的力量;他支持阿联,是为了将反美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推向高潮。1956年9月17日他对埃及驻华大使说:埃及处在反帝战线上的“最前哨”,而“中国是在另一条反帝战线的最前哨。”“有了你们,我们就好办了。如果你们垮台,我们这里也不好办。”<sup>[52]</sup>他关注也门,缘于该国受到西方国家与海湾君主国的排斥。1958年1月2日毛泽东会见北也门副首相时说:“我们是在两条战线上,你们在西,我们在东,而敌人是一个。”所以,“我们互相支持”。<sup>[53]</sup>

然而,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的外交政策无疑具有过渡性,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正在酝酿重大变动。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中苏两党关系持续恶化,中苏两国出现边界冲突,中苏矛盾超越中美矛盾,“打倒苏修”成为文革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支柱;与此同时,美国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有所下降,西欧和日本的地位相对上升。在此情况下,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构想。<sup>[54]</sup>

与20世纪50年代强调的“三个主义”划分相比,7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构想,均基于毛泽东的斗争理念,即世界是异质的,且不同质的国家彼此冲突。然而“三个世界”构想的迥异之处在于,它完全不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资本主义领头羊美国与首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同属“第一世界”,构成后两个世界的斗争对象;西欧、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属“第二世界”,却分别受制于美国和苏联,并且与“第三世界”矛盾重重;原本属于“社会主义”一员的中国,却与亚非拉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

属“第三世界”。这种截然不同的划分,实质在于淡化反美而强化反苏,反映两个彼此联系的事实:一是中苏从20世纪50年代的同盟变成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的敌人,中苏矛盾不亚于中美矛盾甚至超越中美矛盾,这一态势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并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后尤其明显;二是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以中苏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并呈现对抗状态。因此,在1969年春中苏珍宝岛战役爆发后,毛泽东转而强调苏联在中东的政治野心。1970年8月11日毛泽东会见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时说:苏联想控制南也门等阿拉伯国家,所以他奉劝南也门领导人早日摆脱苏联的控制。<sup>[55]</sup>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提出“搞一条横线”,合力应对苏联扩张。<sup>[56]</sup>1973年11月12日毛泽东再次会见基辛格时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苏联野心很大,就是欧洲、亚洲两个洲都想霸占,甚至非洲北部。”<sup>[57]</sup>到1974年1月5日,毛泽东进而主张联合苏联周边的“一大片”国家,防止其称霸。<sup>[58]</sup>

综上所述,建国以来尤其是中阿建交后,毛泽东依据国内局势的需要与中美苏关系的演变,决定中国对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政策。毛泽东对该地区局势的判断,则具有持续性和阶段性、全面性和重点性。

#### [注释]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M]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5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M]第3卷,第15页。
- [2] Arthur Goldschmidt Jr. and Lawrence Davidson,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Boulder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 2006, pp. 318—319.
- [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400页和41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M],中央文献出版社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页。
- [4] Arthur Goldschmidt Jr. and Lawrence Davidson,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pp. 318—319.
- [5]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98—399页。
- [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87—388页。
- [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89—390页。
- [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98—399页。
- [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412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44页和349页。
- [10]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620页。
- [1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391页。
- [12] Tareq Y. Ismael, *Middle East Politics Today: Government and*

- Civil Society*, Florid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1, pp. 397—398.
- [13] 哈全安:《中东史:610—2000》[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42页。
- [14]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71页。
- [15]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09页。
- [16] Arthur Goldschmidt Jr. and Lawrence Davidson,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pp. 321—322.
- [1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60页。
- [18] Arthur Goldschmidt Jr. and Lawrence Davidson,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pp.321—322.
- [19] Arthur Goldschmidt Jr. and Lawrence Davidson,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pp.339—340.
- [20] Arthur Goldschmidt Jr. and Lawrence Davidson,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pp.339—340.
- [21] M E Yapp, *The Near East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1, pp. 199—200.
- [22] M E Yapp, *The Near East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 p. 367.
- [2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17页。
- [24] Arthur Goldschmidt Jr. and Lawrence Davidson,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pp.339—340.
- [25]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57页。
- [26] Arthur Goldschmidt Jr. and Lawrence Davidson,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p. 253, p. 257, p. 261, p. 267.
- [27]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9页。
- [28] Arthur Goldschmidt Jr. and Lawrence Davidson,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p.306.
- [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C]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页。
- [30]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47—249页。
- [31]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47—249页。
- [3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602页。
- [3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4页。
- [34] Arthur Goldschmidt Jr. and Lawrence Davidson,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pp.312—314.
- [35]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3页。
- [3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69页。
- [37]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91—299页。
- [3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210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36—537页。
- [39] 杨灏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M],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6—77页。
- [4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 [4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43页。
- [4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91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43—344页。
- [4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69—370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5—336页。
- [44] 杨灏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M],第79—85页。
- [4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2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308页。
- [46] Arthur Goldschmidt Jr. and Lawrence Davidson,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p.321.
- [47] M. E. Yapp, *The Near East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 p.252.
- [48]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63—565页。
- [4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91页。
- [50]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3页、第390页和第411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42页。
- [51]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8页、第563—565页。
- [52]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47—249页。
- [5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71页。
- [54]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0—601页。
- [55]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17页。
- [5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69页。
- [5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03—504页。
- [5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18页。

作者简介:刘志华,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天津,300350)

收稿日期:2016-03-15

修改日期:2016-05-25



---

South. Low-carbon development needs new ideas for climate governance, such as breaking the paradox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strengthening dialogues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s for climate justice, and promoting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climate policies and trade regulations.

**26 The Neutrality Dilemma of ICRC under the Situation of New War: The Case of ICRC's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in Afghanistan (1989—2014)** by Pan Nini & Li Junlian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 as a drafter of *Geneva Convention*,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in armed conflict areas. Thus, “neutrality” make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in ICRC's actions. However, in history this principle has always faced challenges from national-interests. And currently, the “new war” between the states and the extremist groups brings new meanings to the neutrality dilemma. As a significant geopolitical area suffering from long-term chaos, the situation in Afghanistan has undergone an essential shift since the “9.11” incident, demonstrating significant “new war” features. Under such new circumstances, the neutrality dilemma facing ICRC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pressure from powers, but also derives from the social identity of itself, which leads the organization to “voluntarily” falling into the dilemma. The social identity of ICRC arises from its financial dependence on developed democracies, its Swiss nature and the Western-centered identity.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hese factors on the ICRC's neutrality dilemma would promote and improve the glob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mechanism.

**34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Alaska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U.S. Arctic Affairs**

by Sun Kai & Yang Songlin

The state of Alaska is very important in U.S. Arctic strategy. Alaska is an important energy source and military base for the U.S., and is the basis for U.S. Arctic interests. Alaska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in resource development, priorities in agenda-set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treatment of Alaska native people.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ctic depends on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tate of Alaska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ecause they share many common goals in safeguarding U.S. national interests, building better infrastructures, and promoting science development, etc. Under the U.S. constitutional system, the development in U.S. Arctic is under the tug-of-war between the state of Alaska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41 Exploration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 in the Field of Cyber Security**

by Jiang Shixue

China-EU cooperation in cyber-security can benefit their active role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improve their bilateral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established in 2003. Furthermore, it can also contribute to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the internet in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hina and the EU can promote their cyber-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following ways: strengthening political trust, making the China-EU Cyber Taskforce more effective,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of information exchanges in the area of cyber-security, carrying out joint cyber exercise, seeking the possibility of laying an undersea communications cable,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promoting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at the EU level as well as at the member states level, encouraging the military to have more collaboration, and increasing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in making international rules.

**49 Mao Zedong's Judgment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Arab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by Liu Zhihua

After the PRC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Arab countries in 1956, Mao Zedong began to pay close

---

attention to such events; the Baghdad Pact concluded in 1955; the Suez Canal Event in 1956; the United Arab Republic, founded by Egypt and Syria in February 1958; the Iraqi Coup, and the USA and UK's intrusion into Lebanon and Jordan, in July 1958; North Yemen's econom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1960s; the Third Middle Eastern War in 1967; the South Yemen's social system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1970s. Mao Zedong attached importance to Iraq of Fertile Crescent, Egypt across Asia and Africa, Yemen located in the Arab Peninsula, and regarded them as strategic support of China's diplomatic policies. His thought not only rotated round the relationship of China with the USA and USSR, but also had in mind internal demand.

### **World Economy**

#### **57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nergy Initiative and Its Validity: A Normative Test on the Sample of Energy Cooperation Project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PEC** by Xu Qinhuo, Li Guang & S.P.Popov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several APEC internat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cases (2006—2008) and data results, the thesis has administered a test on *International Energy Initiative* and its validity.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main actors engaged in *International Energy Initiative* mainly includes intergovernment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overnments, business department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he initiative has been divided into 6 types —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type, financial mechanism type, supervision framework typ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ype, information sharing type, as well as education and ability construction type. Under the goals of energy security and energy environment sustainability, there are three final results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Initiative*: realized, abandoned or neglected. Four driving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initiative mainly include the discordanc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ergy industry sector, identity overlap between inter-government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 lack of mechanisms on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inefficiency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during its performance.

### **Countries and Regions**

#### **64 Myanmar's New Alliance of Ethnic Armed Groups: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Future Trends**

by Dai Yonghong & Liu Jinwei

Although Myanmar has been independent for more than 60 years, it has failed to achieve real unity of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orders. Since the Burmese and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have long been in a state of confrontation,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Myanmar Government to execute effective control or management of the ethnic mountainous regions, with the ethnic armed forces ruling these regions separately. In order to avoid being attacked and crushed separately as well as to consolidate their discourse power, in 2011, the ethnic armed forces started a new round of consolidation and formed a new military alliance under the United Nationalities Federal Council (UNFC).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military alliance on the basis of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new EAG alliance and its features and effects, tries to make predictions on the future trends of this new alliance after the new government takes office.

#### **72 Discussion on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Bangladesh**

by Zhang Xing

Bangladesh is located in South Asia, bordering on the Bay of Bengal in the South. This regio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not only in the ancient Silk Road but also in recen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BCIM Economic Corridor".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character,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istory, ethnicity, language movement, Islamic culture, and migrant tradition of this region. It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relevant national character that has emerged from the moral values as well as the social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of the Bangladeshi people.